

从巴基斯坦“新民族”现象解读 跨界民族身份认同*

姜宏毅

【内容摘要】 巴基斯坦“新民族”的形成与阿富汗难民问题息息相关。随着阿富汗政局逐渐平稳，陆续有难民回归，但是仍有大量人员不愿意离开巴基斯坦。其主要是因为阿富汗的条件无法完全保证和平生活，以及缺乏经济机会。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生活了二十多年，新一代的阿富汗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长大，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更多的是巴基斯坦社会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新民族”逐渐形成。“新民族”的诞生也引发了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难民们对阿巴两国的国家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跨界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十分敏感，极易引发跨国安全问题，是对中南亚地区安全的极大隐患，其唯一可行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国际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减少难民数量，帮助阿富汗尽快实现战后重建工作，维护好良性的国内生存环境，以此来实现难民的遣返，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中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 普什图人 新民族 身份认同 跨界民族 中南亚地区

【作者简介】 姜宏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1620）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2-0102-14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2006

* 本文为2022年12月由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十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与秩序：构建与挑战”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身份”（identity）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而普及。这一概念一经问世，便迅速引发社会共鸣。现在，身份概念已成为人类存在于当代世界的必要标签，而身份上的困惑也会极大影响相关个体甚至群体的生存境遇。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对于绝大多数人类个体而言，过去不曾有过的开放选择变得越来越多；同时，这也意味着世界的流动性增强，或者说变化和破坏越来越频繁。总体而言，世界的流动性增强仍是利大于弊：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一代又一代、数以万计的人得以离开缺乏选择机会的村庄和传统社会，奔向能够提供选择机会的地方。^①对于许多阿富汗人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是普什图族难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动乱，为了生计和安全而被迫陆续逃离自己的国家，来到巴基斯坦。虽然阿巴边界两侧都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区，但是在法理上却是两个国家，难民私自穿越边界线，就意味着其在身份上从阿富汗的合法公民变成巴基斯坦的非法移民。显然，难民们奔向“提供选择之地”的决定或许是正确的，但过程必定是痛苦的，此外还会伴生许多次生的难民危机。实际上，不仅是在巴的阿富汗难民，针对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相关政策的争论是当前整个国际社会中有身份问题的核心。但是，问题远不止于此。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身份政治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穷人和边缘化团体“不被他们的同胞看见”^②。在此之前，也有许多阿富汗普什图人移民到巴基斯坦，随即遭遇了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等诸多问题，最终被迫沦为边缘群体。在阿巴两国持续多年的人口迁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流入巴基斯坦境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合法移民，而更多人则是非法移民和难民。其中，很多阿富汗难民去国日久，有的已经举家在巴基斯坦定居多年。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被遣返，因为故国阿富汗的生存条件让他们有家难回。这些阿富汗难民身份认同层面上已经开始变化，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巴基斯坦人。而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变化，意味着巴基斯坦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或者说是新的族群（Ethnic Groups），即“新民族”（New Nation）。“新民族”大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6页。

② 同上，第83—84页。

多为来自阿富汗的普什图族难民，而这些难民几乎都来自 20 世纪阿富汗难民危机以来的三次难民潮。

一、巴基斯坦“新民族”的滥觞

巴基斯坦“新民族”的主体人口是普什图人。普什图人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也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根据阿巴两国官方公布的数据，阿富汗有普什图人 1 110 万，巴基斯坦则有 1 639 万。^① 虽然普什图人起源于阿富汗境内，也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但是阿富汗的普什图人的数量反而少于巴基斯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为了英属印度的利益，强行分离普什图族群，二是进入现代之后受阿富汗难民危机的影响，大量普什图难民从阿富汗逃往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这一人口分布差异现象既体现了普什图人的跨界民族属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巴基斯坦“新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

（一）三次阿富汗难民潮

阿富汗的难民潮大致有三波，第一波发生在 1979 年苏联入侵之后。动荡的政局引发阿富汗国内的恐慌情绪，大量阿富汗人外逃。1979—1984 年，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数量达到 200 万，^② 他们大多来自阿富汗农村地区，如今分散生活在巴基斯坦各个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直到 1989 年苏联撤军，难民危机才稍有缓解，而且此后大约有 20 余万名难民返回了阿富汗。^③ 但与此同时，主政阿富汗的纳吉布拉政府与国内反对外来势力干预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演变为激烈的武装斗争，结果是纳吉布拉政府在 1992 年解体，此后阿富汗政局再次发生动荡，并且

① 《阿富汗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22 年 6 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07/。

② Anwar Alam, “Barriers to Repatr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A Case Study of Afghan Community at Shah and Khusar Colony Board Area Pesha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March 2012, Vol. 2, No. 3, p. 60.

③ Rupert Colville, “The Biggest Caseload in the World,” *Refugees Magazine*, No. 108, June 1997, <http://www.unhcr.org/publications/refugeemag/3b680fbfc/refugees-magazine-issue-108-afghanistan-unending-crisis-biggest-caseload.html>.

陷入内战，随即引发了第二波难民潮。但是这一次大多数难民来自喀布尔市。至于第三波，则要归因于塔利班。虽然塔利班的出现终结了阿富汗内战，但是其主政后实施严苛的高压统治，使许多阿富汗人无法忍耐和接受。因此，又有大量人员逃离阿富汗。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在这一波难民潮中，超过 13 万人离开阿富汗来到了巴基斯坦。^①

（二）难民遣返难题

在塔利班统治期间，阿富汗的贫困问题不断加剧，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饥饿人口急剧增加。因此，从塔利班掌权之后，一直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前的这一段时间，阿富汗难民的数量持续增加，而愿意被遣返的难民则屈指可数。关于当时难民遣返的实际情况，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过 2003—2007 年的数据。2003 年有 34 万人返回阿富汗，2004 年和 2005 年分别有 35 万人和 45 万人；随着遣返工作的展开，联合国难民署预计 2006 年将有 40 万人返回阿富汗，然而实际人数只有 13.2 万人，远低于预期；2007 年也是如此，当年的预期遣返人数是 25 万人，但实际人数只有 12 万。^② 这些数据显示，阿富汗难民的遣返工作并不顺利。难民遣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并且完全取决于目标国的吸引力。对于难民们而言，阿富汗虽然是故土，但是基础设施匮乏且安全状况堪忧，就生存环境而言，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此外，也没有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力因素推动难民返乡——尽管巴基斯坦的生活条件也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与阿富汗相比仍然极具吸引力，因此有大量难民不愿意离开，遣返难题始终存在。

遣返难题的出现，来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本质上还是难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事实证明，大量的阿富汗难民选择了留在巴基斯坦。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当年还是举家从阿富汗一同逃亡，经过在巴基斯坦的多年生活，他们在情感上逐渐疏远阿富汗而更亲近巴基斯坦，因此在身份认同上发生了改变——这些阿富汗难民，就是巴基斯坦的“新民族”。

^① Rupert Colville, “Afghanistan: The Unending Crisis—The Biggest Caseload in the World,” UN Refugee Agency, <https://www.unhcr.org/afghanistan-emergency.html>.

^② Anwar Alam, “Barriers to Repatr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A Case Study of Afghan Community at Shah and Khusar Colony Board Area Pesha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3, March 2012, p. 60.

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族，由于普什图人这一族群在历史上就曾频繁迁移，尤其是在横穿普什图聚居区的阿巴两国边界线——“杜兰线”出现之后，普什图人的跨界行为就变得更加不可控制，其“跨界民族”的属性也变得愈加明显。因此，在“普什图人能够轻易跨越阿巴边界”的基本前提下，不难想见，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大多是普什图人，故而“新民族”的主要构成个体也基本是普什图人。当然，并非所有在巴的普什图人都是难民，也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是“新民族”。实际上，关于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的境遇，学界已经进行过相关研究，并且产生了“中介民族”的表述。

（三）“中介民族”的启示

所谓“中介民族”，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界就曾有所提及。休伯特·布拉洛克（Hubert Blalock）认为，中介少数群体或中介少数民族（Middleman Minority）是在主导和从属群体中发挥调节功能的少数群体，通常为被多数群体隔离了的边缘化种族或族群。^①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普什图人出于各种原因而选择迁居巴基斯坦，他们在巴基斯坦从事各种工作，并逐渐在各个城市和地区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近代，一些普什图人不仅在巴基斯坦的某些行业成为主导人群，甚至在俾路支省等地区的人口数量上形成优势，这些普什图人就充当了巴基斯坦的“中介民族”。在英文学术文献中被提及的“中介人少数群体”或“中介人少数民族”，实际上指的就是中介民族。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中扮演着调解、糅合、联络、融通的角色；而普什图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介民族，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跨界民族属性，从而经常游走于巴基斯坦各个城市与地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身为少数民族而被当地主体民族边缘化，从而被迫成为中介民族。仅从这一点而言，“新民族”在巴基斯坦的处境与中介民族十分相似。那么，“新民族”究竟是一个拥有全新身份的群体，还是隶属于中介民族的一个分支呢？的确，“新民族”和中介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从主要成员的构成来看，二者的主体成员都是外来的阿富汗人，而且都是普什图人，甚至很多都是难民。因此，“新民族”也确实很像是中介民族的某一种类型。但

^① Hubert M. Blalock,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 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1967, p. 14.

是，尽管同为外来的阿富汗普什图人，“新民族”和中介民族之间亦有差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两个群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中介民族仍然没有融入巴基斯坦社会，而“新民族”则主动尝试接受“巴基斯坦人”的身份。

二、“新民族”的出现：阿富汗难民的巴基斯坦化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相对而言，各个时代的人类身处的环境变化并不显著，且长期趋于稳定，因此，人类的许多思维也渐渐形成定式，不同地区和社会中所谓文化与风俗习惯大多由此沉积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往往时刻在变化，而更多的变化会不断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新的观念与想法。因此，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时，许多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最终都会迎来改变的那一刻。那些成为“新民族”的普什图人正是经历了这种改变。

（一）“新民族”的成型

如果从 1979 年苏联入侵开始算起，最初一波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已经生活了数十年，很难再回到阿富汗。无论情愿与否，他们都要接受巴基斯坦的新环境。这些难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普什图人，普什图人又习惯聚居，所以即使长期定居在巴基斯坦，也能够保持与在阿富汗时相似的生活环境，甚至维持普什图人的文化氛围。因此，难民们对巴基斯坦并没有陌生感，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代难民。虽然第二代难民中的大部分人和其父辈一样，依然没有取得巴基斯坦公民身份，在法理上仍旧是阿富汗人，但他们却没能享有作为阿富汗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因此，难民们认为自己在更大程度上是巴基斯坦社会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了难民家庭返回阿富汗的意愿。实际上，由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体现在遣返问题上。从阿富汗背井离乡开始，到在巴基斯坦生活多年，很多阿富汗难民逐渐产生的对巴基斯坦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已经被“巴基斯坦化”（Pakistani）的一个重要佐证，甚至可以说，这些阿富汗难民已经不再考虑重回阿富汗人的身份。虽然在法理上仍然是阿富汗人，但是在心理上俨然是

巴基斯坦人——这个主动选择脱离阿富汗并且尝试融入巴基斯坦的群体，就是“新民族”。由于“新民族”来自阿富汗难民，本身就存在一些固有的移民和难民问题，即亨廷顿所谓的“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更大的矛盾”^①，而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主要就是在身份认同方面，即东道国是否接纳与承认难民的合法身份，以及难民是否愿意承认自身身份的变更。由于东道国巴基斯坦的主流社会和当地的主体民族对于“新民族”这一群体尚未给予足够的承认，因此也导致了“新民族”的承认困境。

（二）“新民族”的承认困境

上文提及，身份认同的构建是双向的，即不仅需要个体的自我认同，而且需要社会层面上的共同接受。也就是说，尽管在“新民族”心中已经自认为是巴基斯坦人，但是在其他民族眼中却依然游离在巴基斯坦社会之外。这种“一厢情愿”的情况是完全可以预料的，毕竟，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取得巴基斯坦国籍的、作为中介民族的普什图人尚且不免遭受排斥，更何况“新民族”这类在法理上尚且是阿富汗公民的普什图人。因此，“新民族”若要寻求被外界所承认，就需要构建起坚实的民族身份。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许多人开始以“世界公民”自居，不再将“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对象。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当今国际社会依然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主要的行为体也依然是现代民族国家；而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与民族的身份仍然至关重要。与当前备受关注的欧洲难民危机相比，阿富汗难民危机牵涉的国家较少（其难民主要是逃往巴基斯坦），而且阿富汗难民也不能像叙利亚难民那样能够前往欧洲、进而造成跨洲的影响，故而其影响远不及欧洲难民危机那样令人瞩目。但是，阿富汗难民群体的主要成员是普什图人，随阿富汗难民危机而产生的巴基斯坦“新民族”现象却值得被同样重视。

对于巴基斯坦“新民族”尤其是身为二代难民的“新民族”而言，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不接受阿富汗，但是巴基斯坦社会也未必会接受他们。这种尴尬的局面实际上是外来移民在初级阶段会产生的通病。以来到欧洲的难民为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58 页。

例，二代难民尤其被夹在两种文化中间，即父母的文化他们没有完全接受，接收国的文化又不完全接受他们；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教极端势力给予他们中的不少人以社群归属、接纳和尊严。因此，一个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事实就是：许多宗教极端主义者都是这种物质生活相对富足但是精神生活空虚并急切地渴望得到认同的新一代移民。甚至可以说，宗教极端主义的形成有时无关贫富，关键在于心理和身份上的认同，这也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对于“新民族”而言，构建强大的民族身份至关重要。

（三）跨界民族身份的构建

民族身份构建并非一日之功。根据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观点，民族身份的构建主要通过四个途径：一是让人口跨越国家边界，即派定居者进入新领土，或强行驱逐领土上的原住民甚至施行种族灭族政策；二是调整边界，使其契合既有的同语言或同文化人群；三是同化少数群体和已有的同族裔、同语言群体；四是重塑民族身份，使其契合相关社会的现有特点。^① 这四条构建民族身份的道路可以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实现，也可以以暴力胁迫方式进行。由于现有的民族大多是复杂历史遗留问题的副产物，因此构建民族身份的途径也并不单一。对当代民族国家而言，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某种方式结合第二条和第四条道路，从而确定一个符合社会多样现实的、包容性的民族身份，同时也能使新来者被这个身份同化。^② 与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相反，“民族”并不是亘古既有的生物实体。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产物，也自然要依靠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构建。这个构建过程既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整个过程都是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活动。因此，一个民族的诞生便意味着社会上某个群体的身份觉醒，且每个民族的内涵都各有不同。对于巴基斯坦“新民族”而言，他们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原本的“阿富汗人”或“普什图人”身份，未成为下一个中介民族，而是选择主动融入巴基斯坦，也可说是部分走完了第四条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新民族”已经认同“巴基斯坦”这一国家身份，并且自认为是巴基斯坦人。相比之下，中介民族则还没有从“普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35—136页。

② 同上，第171页。

什图”的族群身份当中走出来,在主观上仍然自认为是不属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很多中介民族甚至在阿富汗时也从未自认为是“阿富汗人”。由此可见,“新民族”并不属于中介民族的范畴,二者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然,中介民族对“新民族”的产生依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介民族无疑是阿富汗移民在巴基斯坦进行立足的成功尝试,也是体现普什图人作为跨界民族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学界对于“中介民族”所作出的定义,也为探究“新民族”的概念提供了借鉴,并且可以由此解读出“新民族”的其他价值——认识跨界民族的身份认同困境。

三、“新民族”的意义：普什图人的跨界民族主义展望

在当代世界,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多样性身份的存在,既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一种价值。^①可以说,仅从“多样性”这一点而言,身为跨界民族的普什图人,凭借其中介民族和“新民族”等多重民族身份,无疑极大丰富了巴基斯坦的民族关系。但与此相对应,普什图人多样的跨界民族身份认同,也将巴基斯坦的民族问题复杂化了。

(一) 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升华

巴基斯坦是多民族国家,从建国伊始就面临着诸多民族主义问题。除了主体民族旁遮普人以外,巴基斯坦境内还有普什图人、信德人和俾路支人等不同民族,他们各自具有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穆哈吉尔人就一直在不同种族间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维护本族群的利益。至于有些更小的群体,如在旁遮普省南部讲西莱基语的社区,自 20 世纪末以来,也有成员开始在种族界线之间行动。可以说,除了在巴基斯坦占主导地位的旁遮普人之外,所有少数民族以及小的地方性族群团体都声称,由于政治权力全都被主体民族所集中掌握,他们被边缘化了。^②即使是在如此众多的充满利益诉求的民族群体当中,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 123 页。

^② Tariq Anwar Khan, Adil Khan, and Muhammad Imran Mehsud, “Ethnic Diversity and Federation of Pakistan: A Societal Perspective,”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普什图人也无疑是最活跃的那一批。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的少数民族，故而能够顺理成章地以边缘群体自居，并且敢于公开本族群的利益诉求。更何况，普什图人在人数上也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而且仅以绝对人口数量而言的话，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多的，因此，在庞大人口基数的助力下，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发酵，并且在巴基斯坦显得尤为高涨。显然，在此情绪的影响之下，普什图人“中介民族”等身份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在普什图民族主义的长期影响下，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一直带有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长期以来，在整体上与巴基斯坦整个国家都显得格格不入，并难以融入巴基斯坦社会。中介民族的存在本身，便是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体现。但是，普什图民族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英属印度，印巴分治之后，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影响主要是作用在巴基斯坦境内，而“新民族”都是晚近才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普什图难民，故而在观念上才得以不受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左右。

虽然“新民族”在法理上仍然是阿富汗公民，但是却比作为中介民族的普什图人甚至巴基斯坦本国公民更加“巴基斯坦化”。换言之，作为中介民族的普什图人，其身份认同依然侧重于族群，即“我是一个普什图人”；而作为“新民族”的普什图人，其身份认同则属于国族（Nation），即从阿富汗完全倒向了巴基斯坦，认为“我是一个巴基斯坦人”。当然，“新民族”在本质上终究还是摆脱不了“阿富汗难民”与“非法移民”的标签，而且，不仅是“新民族”，对于所有跨界民族而言，始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就是移民与难民归化问题。

（二）移民与难民归化难题的解答

“新民族”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是阿富汗难民主动融入巴基斯坦社会的产物，在此之前，一个群体主动进行的自我身份认同变更的行为是极其罕见的，更何况这一群体是作为跨界民族而拥有深厚民族（族群）身份认同的普什图人。因此，“新民族”现象可能将会成为南亚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毕竟，放眼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民族问题构成最大挑战的

政策议题几乎都是围绕着移民这一话题以及其他一些和难民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新民族”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毕竟，根据过往历史来看，来自西亚地区等国家的移民总是比其他地区来的移民更具争议性，巴基斯坦“中介民族”就属于此类，他们生活在普什图人的聚居区，并且几乎不融入巴基斯坦社会。^① 移民引发反弹，这不足为奇，因为在巴的普什图移民数量确实较多，所以文化上的碰撞确实比较激烈，有些情况堪称史无前例。但是，在巴基斯坦，即便移民数量逐年增加，作为中介民族的普什图人依然是以少数状态存在的。除此之外，由于普什图人存在聚居习惯，在巴基斯坦的每个城市里都有着普什图人的社区，因此普什图人在各地都处在被当地主体民族包围的环境中，一旦出现挑动民族情绪的争端或是有关经济利益等方面的争夺，身为中介民族的普什图人往往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受到多方的怀疑、排挤乃至污名化，进而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但是，“新民族”却不在此列。

由于构成“新民族”的主要群体大多是来自阿富汗的普什图难民，他们本就与靠近阿巴边界地区的巴基斯坦人血缘相近、习俗相仿，因此，他们来到巴基斯坦之后也一般会选择定居在普什图聚居区。一般认为，大多数阿富汗难民的归宿终将是成为与巴基斯坦“若即若离”的中介民族，仅忠诚于家庭和民族而非国家；但是，“新民族”的出现，无疑颠覆了世人对普什图人“只有部落和民族而不知有国家”的刻板印象。“新民族”的形成和普什图人国族认同的初步构建，不仅意味着难民们主动选择融入巴基斯坦社会，成为移民归化和少数民族接受国家身份的典型案例，而且为（同为普什图人的）阿富汗普什图族与国内其余各少数民族之间重构良性的族裔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都是普什图人数量较多的国家，而且都面临着国内复杂的种族冲突与民族分离问题，因此，“新民族”的另一重现实意义，便是展示了作为跨界民族的普什图人的身份认同转变过程，让阿巴两国可以就此反思其国内族际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并且思考与展望国家未来的走向。可以说，“新民族”的诞生不仅意味着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升华，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 140 页。

对巴基斯坦的族际关系走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还为普什图族占主体的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与国族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乃至对维护整个中南亚地区^①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参考价值。

（三）跨界民族身份研究的展望

普什图人的跨界属性既源于先天的民族性格，也和后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关。普什图人发源于阿巴边界地区。历史上，普什图人和波斯人的交流比较频繁，在南亚地区还被称为“边界部落”。15世纪以后，普什图人逐渐向北移动，并扩散到如今的阿富汗全境地区。可以说，普什图人的跨界民族属性在其族群诞生之初便已初具端倪。19世纪后，普什图人被迫卷入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亚地区的争斗之中，阿富汗也逐渐沦为英属印度抵御沙俄南下的“缓冲国”。1893年，英阿双方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与谈判，最终确定了“杜兰线”，将一部分普什图人连同脚下的土地从阿富汗划归印度。

“杜兰线”从法理上确定了阿富汗与英属印度的边界，在印巴分治之后也成为如今阿巴两国的边界线。更重要的是，“杜兰线”的出现，使得阿巴边界地区的普什图山地部落区一分为二，让普什图人原本正常的族群内部流动变成非法的跨界行为，为后来诸多与普什图人相关的跨界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新民族”的诞生，便是源自普什图人的跨界行为（阿富汗难民潮）。

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新民族”不仅意味着国内的少数民族或者移民与难民的归化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也为其治理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可能性。对于阿富汗而言，“新民族”意味着普什图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开始出现进展，不再局限于部落和族群身份，而是逐步构建起国家认同——这为塔利班政权塑造国家凝聚力、把握国内各族裔关系的走向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阿富汗顺利进行战后重建。可以说，“新民族”不仅标志着南亚地区民族问题的新现象，也为民族问题的研究创造了新的方向，更是跨界民族身份转型的典型案列。“新民族”的形成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新民族”源自阿富汗难民群体，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必然出现身兼“阿富

^① 本文的研究区域属于“中南亚”地区。但是关于此概念的准确定义，在学界仍有待继续讨论。中国学者潘志平提出的“中南亚”概念，大体界定在中亚五国、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

汗难民”和“跨界民族”双重身份的普什图人所无法承受的身份错乱，而这种身份错乱状况经常是威胁中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的重大隐患。实际上，“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历经波折之后才会在相应的群体中确立全新的民族身份，由此观之，距离“新民族”被国际社会所正式承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新民族”这一概念虽然略显争议，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被笔者冠以“新民族”之名的群体无疑是切实存在的，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产生的问题也切实产生了包括威胁中南亚地区安全在内的广泛影响，既然如此，“新民族”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其意义。身为来自阿富汗的普什图难民，“新民族”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反而率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仅就这一点而言，“新民族”的研究价值便得以凸显，更何况他们的存在还反映出困扰当下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且不限于难民遣返、移民归化、民族认同、极端主义、身份政治等。

结 束 语

“身份”是当今诸多政治现象的基本主题，本文中的普什图人所经历的从阿富汗难民到巴基斯坦“新民族”的转变，莫不与身份这一主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不可能不用身份的语言思考自身、思考社会。但是，“身份”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导致分裂，也可促进整合，只有正确认识“身份”，并且在此基础上将“身份”加以妥善引导与利用，才能够趋利避害，并尝试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对于当今的身份政治研究者而言，如何把小的身份纳入大的身份当中，是解决身份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方式。显然，成为巴基斯坦“新民族”的阿富汗难民就是在身体力行地把小的“普什图”民族身份纳入大的“巴基斯坦”国家身份。国家身份可在正式的法律和制度规定中得到体现，民族身份也始于对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共同信念，例如，教育系统教给儿童怎样的本国历史，或者哪种语言被视为官方的民族语言。但民族身份也延伸到文化和价值观领域，它包括人们讲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他们

从哪里来，他们赞美什么，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怎样才能真正成为该社群的一员。^①从这一点来看，巴基斯坦“新民族”的形成这件事本身就意味深长——原本身为阿富汗难民这一小群体的他们，主动选择融入了巴基斯坦这个大的整体。

巴基斯坦“新民族”的诞生虽然是普什图人身份构建上的一大突破，但也引发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尤其是“新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虽然“新民族”自身已经认同是巴基斯坦人，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和其他巴基斯坦人却未必接受他们成为“巴基斯坦”群体中的一份子，“新民族”的移民归化之路上依然存在来自东道国的考验；而且，其余没有成为“新民族”的难民们的身份认同问题更为棘手，他们依然坚守“普什图”的身份认同，因此在阿巴两国之间游移不定，即在情感上渴望回归阿富汗，但是现实生活逼迫他们只得继续留在巴基斯坦。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期待值落差，以及摇摆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身份纠结，很容易对难民的心理和精神造成创伤，可能促使他们产生冲动情绪，进而寻求极端主义思想的慰藉，甚至会投身于极端组织，威胁国家与地区安全。因此，“新民族”现象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民族问题等研究领域的突破，而且会连带产生新的跨国问题。为了解决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只能依靠国际社会多方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帮助阿富汗尽快实现战后重建工作，从源头上减少难民的数量，并且以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内环境来实现难民的遣返，保证中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巴基斯坦的情况，保证难民的归化工作顺利进行，使“新民族”能够及早得到广泛承认，并且顺利融入巴基斯坦社会。

如果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隔成越来越小、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也是可能的。就像巴基斯坦“新民族”一样，用新的身份认同来解决原有的身份问题。现代世界虽然不会摆脱身份政治，但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使其身份更加有意义。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Rogers M. Smith, *Political Peoplehood: The Roles of Valu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 84.